

土耳其： “欧洲之母”的复兴

经历一个世纪的起落，土耳其重获生机。在伊斯坦布尔的古迹中，我们追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沉淀，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与凯末尔时代的复兴，让人感叹中国和土耳其的百年兴衰何其相似。

土耳其人一直在思考，自己应该归属于亚洲还是欧洲，东方还是西方，伊斯兰信仰与商业财富有没有冲突。也许，正是这种暧昧和自相矛盾，造就了土耳其独一无二的个性。

过去6年堪称土耳其自1970年来经济和政治最稳定的时期。在埃尔多安总理的带领下，土耳其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宏观经济更为稳定，宪政和司法也有所改革，确立了军队的文职控制权，并改善了库尔德人的人权状况。这一切都预示着，土耳其将成为欧亚大陆十字路口一个更为稳定和健康的国际力量。

此行的另一站是中部城市开塞利，类似于“东亚四小龙”，这里被称为“安纳托利亚老虎”。曾是丝绸之路旧址的商贸小镇，以制造中心的身份，进入全球经济的产业链。从过去的羊、小麦和地毯，进化到今天的家具、牛仔布和电缆。开塞利和土耳其中部的经济成功，以及当地人对政治和宗教的态度，将为土耳其的转型提供更多的动力。



伊斯坦布尔：明日的世界之都

文_黄锬坚 文海晶 摄影_邸晋军

“她将在一个世纪内成为世界的首都。”150年前，法国作家福楼拜预言。当他置身于伊斯坦布尔熙攘的街头，当地人多彩的生活让他大发感慨。

4月9日，经过10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降落在这座充满穹顶和宣礼塔的文明古城。但伊斯坦布尔交通状况之恐怖，让人感到这里不是世界之都，而是世界之“堵”。当天正是复活节，仿佛度假的人们全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集合。从贝尤鲁(Beyoglu)附近的海岸到Emirgan，不到10公里的路程，我们乘车竟然花了3个小时。

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古城一分为二，再加上金角湾，伊斯坦布尔被水流切割成3大块。在缎子般泛着波光的水面上，可以看到移动的白色豪华酒店，那是游弋在欧亚分界线上的巨轮。沿岸排列着精致的白色游艇，据说有钱人喜欢乘游艇穿梭于城市的各个渡口，这样免却了堵车之忧，还能少受尾气污染的毒害。

当黄色出租车排成长龙慢慢磨蹭时，我们也有空留意海岸线的景致。在穿梭的人流中，每隔两三米就伫立着一位钓鱼者。而道路两旁满是耀眼的艳丽跑车，车厢里金发墨镜的男女。一切都洋溢着富庶和闲适。似乎全土耳其都在度假，所有伊斯坦布尔人都来到了水边。

亚欧非的熔炉

我们的目的地是Emirgan的Sabanci博物馆，这里正在举行“成吉思汗艺术展”。在博物馆二楼的咖啡馆，我们见到了Sedef Kabas，当地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有人称她为“土耳其的Larry King”。每周工作日，屏幕上都会出现她现场访谈新闻当事人的场景。从美国CNN回到土耳其后，她已经访谈了近千位名人。

就在Sedef大谈国事和女性地位后，她的妈妈带我游览了这个面朝海峡的咖啡馆。我惊讶地发现，母女俩长得不太一样，妈妈蓝眼白发，像德国人，而女儿黑眼金发，有拉丁美女的模样。母亲被这个发现逗乐了，她把我带到几个服务员面前说：“这个小伙子怎么

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千百年来一直就是东西文明的大熔炉。当人们带着偏见，用特定的民族、东方/西方、伊斯兰教/基督教来给它定性时，必将是缘木求鱼。

样？像阿拉伯人。不，他是土耳其人。这个小伙子呢？像北欧人。不，他也是土耳其人。”她自豪地说，土耳其人来自四面八方，这里是世界的中心。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人们很难再用种族或血统来简单化地划分人群。美国被称为“大熔炉”，因为那里融和了东西方各大洲的种族和文化。而土耳其，更是在数百年前就汇聚了来自亚非欧大陆的人们。法国作家Gautier在1852年写道，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你可以听见土耳其语、亚美尼亚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还有拉地诺语，一种西班牙犹太人说的方言。他有些自卑地说，在这个“巴别塔”里，许多人竟然会好几门语言，而他们法国人，则只会自己的母语。

也许有必要复习一下地理知识，土耳其正当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南部。东南边的邻居是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与不安定的中东咫尺之遥，而东北部则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直通前苏联地区和中亚。在西北，土耳其与保加利亚、希腊毗连，西南隔地中海与塞浦路斯相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两海峡间的马尔马拉海，是沟通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水道，战略位





置不容置疑。

在采访中，我们特意询问了采访对象的老家出处。TUSIAD国际部主席Aldo Kaslowski，祖籍意大利，家姓出自波兰。而牛仔布大厂Orta Anadolu的销售经理，则是一位高加索女人。确切地说，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千百年来一直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大熔炉。当人们带着偏见，用特定的民族、东方/西方、伊斯兰教/基督教来给它定性时，必将是缘木求鱼。

近百年来，土耳其人一直在思考，自己应该归属于亚洲还是欧洲，东方还是西方，伊斯兰信仰与商业财富有没有冲突。也许，正是这种暧昧和自相矛盾，造就了土耳其独一无二的个性。

帝国斜阳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和中国比拼历史，土耳其将是毫不含糊的候选者。稍微留意，你会发现，伊斯坦布尔其实是好几个帝国的首都所在地。或者说，没有哪个城市和伊斯坦布尔一样，如此紧张、漫长地经历过东西方冲突的塑造和伤害。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城市的记忆》中奥尔罕·帕慕克写道。这位土

耳其作家，凭借“寻找故乡忧郁灵魂”，发现了“标志冲突的新符号和文化间的交织”而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帕慕克的记忆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奥斯曼帝国崩溃，而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继承了奥斯曼的大部分国土和文化，并将首都迁到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从此也就脱离了福楼拜的预测，消失在世人眼中。

我们所住的老城区，的确有些帝国斜阳的沧桑。从小旅馆走出去没多远，就可以看到海岸边风蚀残败的城墙。而矗立于海角上的托普卡珀宫，则让人惊叹奥斯曼帝国的奢华生活。皇宫以穹顶建筑为主，全部是雪白大理石铺就的地面。后宫墙壁上，贴满了蓝色瓷砖，那是奥斯曼时期特有的图案，枝蔓缠绕。让人失望的是，没穿过几进院子，皇宫就到了尽头，和北京故宫的气势相比差远了。

不过，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有浪漫情调，他们把皇宫建筑在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相交的半岛尖角上，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对岸的风景。在珍宝展厅里，皇冠上的钻石和祖母绿散发着诱人犯罪的光芒。在一间展厅里，陈列着大量明清瓷器。可以想见，当年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正是亚欧大陆的两大帝国。经历100年的衰老，如今两个国家又开始缓步爬升世界权力的台阶。

土耳其对欧洲和西方有着爱恨交织的情感。一方面，他们全面拥抱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侮辱和伤害。

过去五百多年，伊斯兰教占据着古城，所以市内有三千余座大小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则多达一千余座。举目四望，总会有造型各异的宣礼塔映入眼帘，故这里也有“宣礼塔城”之称。

最让人感慨的地方是阿亚索菲亚博物馆(Ayasofya Muzesi)，或称圣索非亚大教堂。从它身上，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一览无遗。它最初由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6年兴建，当时堪称世界最大的教堂。帝国的首都也从罗马迁都于此地，改名君士坦丁堡。6世纪时，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帝将它改建成拜占庭式的建筑时，从古代小亚细亚各地搜刮来许多财物，从埃菲索斯的阿尔忒弥斯神庙掠走几根柱子，并派最好的镶嵌画工匠师和壁画艺术家装饰内部。

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占此城，灭亡东罗马，这里又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伊斯兰军队占领该城后，并未摧毁这个教堂。苏丹穆罕默德让基本建筑得以保留，只在教堂外面的四个角竖起高高的宣礼塔。而内部的基督教画像因为无法为伊斯兰教所接受，全部被涂上了灰泥，此举无意中将它们保护了下来，直到19世纪末修复时才重见天日。

阿亚索菲亚墙上层层叠叠的壁画，映射着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东方和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次次冲刷着这块土地，最后都沉淀下来。当你拨开厚厚的岩层，可以看见不同年代的文明胜景。今日的土耳其同样如此，当你拨开社会、政治、经济的面纱，很容易看到，亚洲和欧洲、传统和现代，在冲突，但更在融和。

无所不在的国父

土耳其的历史过于沉重，除了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文明，在今日土耳其人生活中，国父凯末尔仍然发挥着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在钱币上、在教室里、在挂毯上、在博斯普鲁斯沿岸城墙上，你都会发现Ataturk(土耳其语，土耳其国父)的头像。这位目光睿智而坚定的长者，注视着土耳其的一举一动。

凯末尔，对中国人而言，只是中学历史课本里的一个章节。但土中两国的历史，其实在凯末尔年代，有着颇为相似的屈辱和忧伤。

与大清王朝遥相呼应，奥斯曼帝国在十五六世纪进入鼎盛期，版图扩及欧、亚、非三洲，或者说控制着今日的中东、巴尔干、北非、克里米亚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但到十七八世纪时，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的交战迭遭失败，丧失大片土地。19世纪时，西方列强逐渐强大，而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代，英法俄奥也对奥斯曼虎视眈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参加了同盟国，战败后部分领

土被希腊、英国等占领。1919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民族抗战运动爆发。此后废除苏丹制，废除奥斯曼哈里发(前伊斯兰教领导人君主)的王位，并于1923年10月29日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曾经一度对土耳其产生过兴趣，那时的国人把凯末尔视为对一个古老帝国实行现代化改造的成功范例，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中，是要向土耳其学习、向凯末尔学习。

传统，在“五四”文人和凯末尔眼中，都是前进的障碍。而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则应该全盘接纳。也许因为凯末尔对这块土地爱得太深，所以改革力度也最果决。“凯末尔主义”有六条原则，其中的世俗主义确定了宗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核心是“三分离”。





看看这些与传统一刀两断的政策吧：他推翻了源自穆罕默德后人的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在教育方面，他废除了伊斯兰教长制、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特别沙里亚法庭）以及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制订和采用依据西欧国家法律为摹本的新民法等。凯末尔还将土耳其使用的阿拉伯文改成了拉丁字母，并以激烈的手段完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服饰革命。这些举措都为土耳其的世俗化扫清了障碍，该国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区别肇始于此。

在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攻击下，老大帝国该如何自处？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国与土耳其何其相似，也经历了废除科举、结束帝制、剪掉长辫、厉行白话，甚至将汉字拉丁化的过程。

面对传统，激进文人的心态也许类似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老派文人则对传统的凋零黯然神伤。帕慕克有同样的忧伤，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城市的回忆》中他写道：“这种死文化的忧伤依然在我们的周围。想要西化和现代化的愿望越强烈，要摆脱那陷落帝国的苦涩记忆的意愿也越绝望：就像一个被抛弃的情人要把对方的衣服、照片和物事全都扔掉一样。”

凯末尔的另一大贡献是大力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比如废止妇女戴面纱、废除一夫多妻、确立离婚制度。1934年修改的宪法，则让妇女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举措甚至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早，如法国和瑞士。所以，当我们在土耳其屡次提及妇女地位问题时，对方只能回答“女性在哪里都是问题”。言下之意，我们不应用“有色眼镜”看人。

今天，走在土耳其这个99%人口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带面纱的女性已经非常稀少。有人甚至称伊斯坦布尔为“迷你裙和宣礼塔”之间的都会。这一切，都拜凯末尔之赐。

欧盟欲拒还迎

美国人说，欧洲因为历史的负担而压力沉重，这句话对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土耳其更为切题。历史包袱在今日土耳其的反应，集中体现在“加入欧盟”的漫漫征途上。

“为什么欧洲需要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是欧洲的母亲。”在TUSIAD的网站上，一位名为Klaus J. Stohlker的作者写道。在他

看来，甚至在欧洲出现之前，人类就从高加索和黑海地区向西迁移。既然人们说罗马是欧洲的父亲，那么说土耳其是欧洲的母亲并不为过。而且欧洲文化与知识的很大部分，其实来自今日土耳其所在的地区。不论其修辞和表白如何有理有据，作者趋附欧洲的姿态一览无遗。

TUSIAD是土耳其工业家和商人协会（Turkish Industrialists' and Businessmen's Association）的缩写。“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商业NGO组织，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力促土耳其加入欧盟”，TUSIAD国际部主席Aldo Kaslowski对我们说。

但民众的声音并不那么一致。民众对于欧盟的支持率已经从两年前惊人的80%，锐减到近期的不足50%。1月下旬，在土耳其英文报纸《Today's Zaman》上，一位常发异议的专栏作家 Mehmet Kamis将文章的标题写成“拜拜了，欧洲”。

“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申请肯定是漫长、令人疲乏的，当然也充满教育意义。不过，欧洲的门槛太高，它把进程给堵住了。”Kamis甚至激烈地写道：“只要欧盟愿意，它可以拍土耳其的肩膀；只要它愿意，也可以扇土耳其的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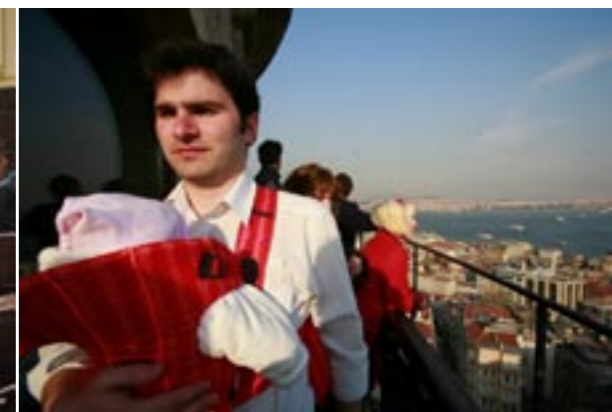
这就是土耳其对欧洲和西方爱恨交织的情感。一方面，他们在一个世纪里全面拥抱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另一方面，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允许受到任何的侮辱和伤害。

其实，土耳其早在1963年就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签署了结盟协定。但是，与周边邻国的冲突、贫困、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等多重因素，使得土耳其的成员资格问题一直悬空。到了1999年，土耳其才被接纳为正式候选国。

从“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2002年执政之后，土耳其开始有可能实现完全成员资格。

过去4年，AK党出身的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强有力而卓有成就的改革者，他进行了经济、宪政和司法改革，确立了军队的文职控制权，并改善了库尔德人（Kurd）的人权状况。新的谈判在2005年10月正式启动。

但没有人指望进展会迅速，人们都说，最快也要10年，土耳其才能入盟。每隔几个月，双方就会争吵一次。欧盟国家的指责，多半集中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上。（塞浦路斯自



1974年以来一直处于分治状态，南部是希腊族控制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北部是由土耳其族控制，只得到土耳其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2004年5月1日，在塞浦路斯两族就统一问题举行的公决失败之后，塞浦路斯加入了欧盟。）

对欧洲而言，土耳其别具意味。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中，这几乎是唯一一个政教分离、民主政治并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话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描绘了这样的路线图：“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欧盟的完全成员，那将向全世界证明，各种文明的分界线，不应依据宗教或文化来划分，而应在民主、现代化、拥抱改革的决心与集权主义、极端主义和暮气沉沉之间来划分。



拥抱还是放弃欧洲？土耳其的身份问题，从历史绵延向未来。也许正如作家Elif Shafak所说，伊斯坦布尔依然不知道它到底属于哪里。“它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记忆和失忆之间徘徊”。

大巴扎、贝尤鲁与宣礼塔

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伊斯坦布尔从来就是商人的乐园。老城区的大巴扎(Grand Bazaar)有650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室内市场。店铺鳞次栉比，纵横交错的街道形成棋盘格，而走道上盖着的拱顶，把整个大巴扎连成一座购物迷宫。真金白银、水晶琥珀制品在橱窗里烁烁放光；彩色的玻璃吊灯发出奢靡的苏丹气息；陶器碗盏上，手绘着葡萄藤蔓和奥斯曼的古画；大片缀着金属亮片的头巾、绣着金丝和红穗的缎子拖鞋、土耳其特有的木制棋盘。大巴扎里的店主非常好客，他们会热情询问你来自日本、韩国还是中国台湾。当然，到了砍价阶段，他们和中国人一样精明。

如果说大巴扎仍然是古老东方的遗产，那么贝尤鲁（Beyoglu）则是西方时尚的展厅。这片地方从19世纪开始就开发成了“小欧洲”。当时许多外交人员、银行家在此建造了壮观的欧式宅第。这群数量可观的外国人有着深厚的希腊和犹太文化根基。从时尚精品店、银行到戏院和公寓，这里与欧洲城市没有区别。土耳其近年的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所以国际时尚品牌和奢侈品卖家纷纷涌入，比如Vakko、Harvey Nichols、Ferragamo、Fendi和Louis Vuitton都已在伊斯坦布尔安营扎寨。贝尤鲁熙熙攘攘的人群，让你感受到这个国度的年轻与活力。要知道，土耳其一半的人口年龄低于25岁。

走在时尚繁华的贝尤鲁，一个疑问经常跳出脑海：这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吗？在琳琅满目的报摊上，陈列着各种西方杂志的土耳其版，比如《商业周刊》、《ELLE》等时尚杂志、《Premiere》之类电影刊物，《PC Magazine》等科技期刊，甚至还有《FHM》。一句话，和纽约曼哈顿的街景几乎没有区别。如果说科技、时尚、消费和欲望是西方的豪华外衣，那么伊斯坦布尔的这件衣服毫不逊色。

唯一的区别还是在清真寺，在宣礼塔。不论白天的城市如何喧嚣，在凌晨5点，在夜晚9点，我都能听到宣礼塔播放的呼唤礼拜声，那悠扬空旷的韵律，与其说是召唤人们礼拜，不如说是信仰力量的最好表达。周围的集市叫卖和喧嚣人群似乎突然消失，我仿佛进入某种神秘境地：沙漠、无边的穹顶清真寺，还有裹着白头巾礼拜的阿拉伯人。

埃尔多安总理的话也许可以稀释这种现代和传统的冲突：“土耳其社会很大一部分渴望选择现代观念但不否定传统，一种普世主义同时接受地方主义的信念，对理性有所理解但并不忽视精神生命的意义。”

消逝的“牧羊人”

不要以为伊斯坦布尔一直如此繁华。就如停电、停热水偶尔会袭击古城一样，过去几十年，土耳其的经济并不稳定。除了烤肉、土耳其浴，在国内听到最多的土耳其传闻还包括不值钱的里拉。

如果3年前来土耳其，你会轻易成为百万富翁。当时土耳其硬币面额最小的为5万里拉，而乘坐一段短程出租车就可花掉500万或1000万里拉，一顿大餐恐怕得上亿元。几十年来，土耳其持续遭遇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比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2.8比1变为21世纪初的1350万比1。2001年，土耳其陷入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达70%，里拉严重贬值并且200万人失业。

幸运的是，2002年新政府上台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每年以7%的增长率逐年增长，这个速度是欧盟的4倍。从2005年元旦起，土耳其新货币启用，面额比旧货币整整少了6个零。现在打个车，也就几十块钱了。2006年土耳其全年消费价格只上涨9.65%，与2001年相比，宏观经济已经大为改善。

人们评论说，过去5年是土耳其自1970年以来时间最长、最稳定的经济增长期。总理埃尔多安声称，他将在下一个5年，使该国人均收入提升到一万美元。

ESI(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是一家研究准欧盟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创始人Gerald Knaus是一位土耳其专家。在博斯普鲁斯海岸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给我们剖析了土耳其的经济问题。在他看来，2001年危机的最大原因是政府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公共债务总额从1983年的33%上升至2002年的61%，差不多70%的外债都是政府欠下的。2001年的危机主要是“一场公共债务的危机”。国家已经入不敷出了，还在继续花钱。

土耳其经济学家Mina Toksoz这样回顾该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史：“土耳其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型：进口替代工业化和病长的出口工业，直接要求资本市场的解放。然而土耳其经济的转型过程只走了一半。没有跟上趟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和银行重组，这二者本可以带来更具竞争力的经济模式。相反，从1987年起，土耳其政治结构实现了扩大预算支出，这引起了国有银行原有问题的深化，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金制度也随之恶化。”

2000~2001年经济危机迫使土耳其跟过去的政策划清界线。Mina Toksoz写道：“1999年的完结，似乎标志着土耳其15年后才开始处理所有问题：通货膨胀、财政决算、银行业转型、农业私有化、政府的腐败。所有问题在一时间被推上台面。”

可以说，国有企业是凯末尔的遗产。他所提出的“国家主义”，就是由国家统一管理国民经济计划、经济建设，国家直接在工业、交通运输业、银行等方面直接投资经营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这一

埃尔多安总理说的话也许可以稀释现代和传统的冲突：“土耳其社会很大一部分渴望选择现代观念但不否定传统，一种普世主义同时接受地方主义的信念，对理性有所理解但并不忽视精神生命的意义……”

道路是借鉴了前苏联工业化的经验。

过去5年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私有化计划文件已经存在,不过在过去6年售出的国有企业(价值为61.00亿美元)比此前15年(46.0亿美元)还多。据土耳其政府2006年年底公布的预算平衡计划，未来两年将有更多项目被私有化：比如电力分配网、伊兹密尔港、马尔马拉海以及黑海的几个港口、诸多国有大型糖厂，还包括国家石化巨头Petkim公司和烟酒垄断企业Tekel公司等等。

这些改革也深刻改变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这个国家就像一群羊，牧羊人是政府。”直到2001年，“牧羊人”这一概念在大部分土耳其人心中仍是深入人心。而在2002年大选中获胜的“正义和发展”党是对“国家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的直接挑战。“别开口要工作”成了政党领导和现任总理埃尔多安发言必讲的话。

在伊斯坦布尔的传统商业街Istiklal Caddesi，我们看到色彩艳丽的横幅“伊斯坦布尔，欧洲文化之都,2010”。伊斯坦布尔希望2010年成为该城魔幻的一年，为游客、欧洲艺术家、街头观众准备了一系列炫目的活动，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飘浮移动的舞台。这将是回溯7000年历史的一次盛大旅行。

经历辉煌和沉沦，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重新起步，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个新的世界之都的兴起。●

（此次土耳其之行，得到了以下机构和人员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南德意志报驻伊斯坦布尔记者Kai Strittmatter，土耳其驻华大使馆商务处与文化新闻处的朋友）



丝绸织就的成功女性

文_文海晶 摄影_邱晋军



在未到伊斯坦布尔之前，我们猜测着土耳其的女人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头脑中除了全身上下裹着黑纱的妇女，就是关于愚昧残忍的“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s）的媒体报道。然而在这个既现代又西化的伊斯兰国家，事情并不像黑与白那样分明。

对某个地方的印象往往决定于观察者的视角。Nicole 和Hugh Pope在《揭开土耳其的面纱》一书中写道，西欧人看伊斯坦布尔往往看到了一个东欧城市的廉价复制版，然而从中东来的人却在伊斯坦布尔呼吸到了西欧城市的自由空气。雷同的是，西欧来的人往往认为土耳其的女性问题相当严重，而有在贝鲁特、德黑兰以及巴格达居住经验的人则认为土耳其的女性和欧洲的女性一样，自由而自主。

现实往往更接近于马赛克的拼贴。如果你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岸往Eminonu码头方向走，路旁林立的广告牌下会有裹着伊斯兰传统黑纱的妇女经过，她们和高档成衣广告牌上穿着暴露的模特同为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而在码头不远处著名的蓝色清真寺内，在精美彩绘穹顶下的殿堂内祈祷却是男人的专利，虔诚的妇女只能退居到被栅栏隔开的幽暗而狭窄的角落。也是在这个伊斯兰国家，妇女早在1929年底便拥有了选举投票权；而1993年已经有过一位女总理——坦苏·奇莱尔；目前土耳其排名第二的Sabanci家族企业也由女将掌门；土耳其甚至有位伊斯兰女传教士。

西欧来的人往往认为土耳其的女性问题相当严重，而有在贝鲁特、德黑兰以及巴格达居住经验的人则认为土耳其的女性和欧洲的女性一样，自由而自主。

这三位同为《丝绸织就的成功女性》（Silk Made Successes）一书的访谈对象。这本于今年3月出版的土耳其文的书，结集了41位政治家、商人、名流、学者等新闻人物的访谈，她们都是土耳其各行业最成功的女性。“我将丝绸和女性的成功作对比，是因为女人可能看上去脆弱、瘦弱而软弱，可她们一旦成功往往能更持久、更强大。”该书的作者，土耳其最负盛名的SkyTurk新闻女主播Sedef Kabas说。

这位认为丝绸比钢铁更有力量的土耳其女主播，喜欢把自己主持的新闻访谈节目和Larry King Live相比，她似乎很有理由这样说。Sedef每晚45分钟的新闻脱口秀在土耳其已播出了10年，她温婉而不失犀利的提问方式在土耳其人气极佳。Sedef Kabas的走

红至少向我们证明——在土耳其，性别并不是阻隔女性事业成功的一堵高墙。

我们在看得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山顶咖啡馆为Sedef拍照，风从四面八方刮来，带着春日的寒气。穿着薄绸碎花连衣裙加薄棉开衫的Sedef还是觉得冷，但是她自始至终保持着迷人的笑容，非常专业。更让我们感叹的是，面前这位土耳其女主播和欧美最成功的女性性别无二致，她自信、爱美、清楚自己要什么、懂得享受生活并忌讳谈论年龄，连她最大的困扰之一——“事业与家庭不可兼得”也都一模一样。

大多数土耳其女性没有Sedef Kabas那样幸运。“土耳其的女性问题仍然很严重。”一个常驻伊斯坦布尔的智囊团——“欧洲稳定计划”（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的创始人，来自奥地利的Gerald Knaus告诉我们。比如就女性参与经济的程度来看，土耳其仍然落后。和中国46.7%的女性就业率相比，土耳其只有25%左右；中国女性企业家的比例在20%，而土耳其只有12.5%。从伊斯坦布尔进入更为传统的小亚细亚半岛中部，比如安纳托利亚的中心地带，女性就业的情况更糟。拥有“土耳其之虎”之称的开赛利市在近20年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然而当地就业机会的剧增却未能带来妇女就业率的增长。在中国以女性劳动力为主的纺织厂，在开赛利却是男人的天地，妻子外出工作会被视为是丈夫的无能。当地的雇主在能力相当的男女之间也更愿意选择男性，这不仅因为妇女一结婚便会辞职，还因为雇用一位男性往往意味着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对于土耳其更为保守的内陆地区，开赛利的情况更具代表性。

然而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土耳其的妇女地位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土耳其废除了《民法》中规定丈夫是一家之主的条款。而上世纪90年代初，土耳其已经废除了妻子需要得到丈夫的许可才能外出工作的法律。社会的变化还需要时间。除了妇女的独立意识还有待提高外，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也至关重要。土耳其仍然没有公立的幼儿园，为数不多的私立幼儿园费用高昂，老百姓难以负担。土耳其亦没有养老院，于是妇女在家相夫教子、赡养老人便不仅是出于自愿选择，更是非常现实的责任。

但土耳其的女性意识已开始被唤醒。媒体上充满了关于女性问题的报道与专栏，妇女们也开始公开为自己争取权利。2001年《民法》改革的成功也要部分归功于120多个女性团体不遗余力的推动。面对土耳其国会500多名议员中女性代表不到5%的事实，女人们组织起来，贴上伊斯兰式的小胡子到市中心游行。

此外，财富的力量亦在起推动作用，土耳其第二大家族Sabanci的女性掌门人Guler Sabanci正在和联合国合作，为解决最有代表性的女性问题在土耳其各地区进行研究。

在不久的将来，土耳其应该会有更多“丝绸般的成功”。



TUSIAD: 财富的非政府力量

文_文海晶 摄影_邱晋军

在奥斯曼帝国时代，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地的商人来到伊斯坦布尔，前往大巴扎，用金币银币换取突尼斯鞋、波斯地毯、丝绒、麻布、绸缎以及各式珠宝。大巴扎的生意今天依然兴隆，伊斯坦布尔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商机也将意大利人、希腊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吸引到Maslak、Levent以及Zincirlikuyu等中心商务区，他们注下资本，盼望回报。

财富从来都青睐着伊斯坦布尔；财富也是伊斯坦布尔成为穆斯林世界最摩登都市的重要动力。就在今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有26位土耳其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24位。FIBA集团的总裁Hüsnü Özye in以35亿美元的资产荣膺土耳其首富。

除了财富的绝对数量外，企业家对民主程序、自由市场以及欧洲模式的虔诚也是伊斯坦布尔经济的推进器。早在土耳其刚刚开始工业化的1971年，伊斯坦布尔几大家族企业的领军人就按欧洲模式成立了“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USIAD）。TUSIAD成立之初订立的宪章在今天也不过时：协会所从事的活动要以获得土耳其的稳定发展为目的，并争取能保证稳定增长、且与世界市场经济原则一致的社会共识。

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蜕变直到今天自由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TUSIAD的理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而现任总理埃尔多安近年所主持的民法改革更让土耳其所有的非政府组织（NGO）走出禁锢。财富、影响力、美誉和活动空间无疑让今天的TUSIAD成为土耳其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

“我们是个很小的组织，但我们的声音很大。” TUSIAD国际部主席Aldo Kaslowski逗趣儿地说。Kaslowski身着质地很好的灰色西服，庞眉鹤发，风度极佳。TUSIAD目前有六百多会员，多数来自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而他们名下的产业却创造着土耳其40%的附加值、雇佣着土耳其40%的劳动力，并占有土耳其40%的出口份额。这个财富高度集中的组织，日益散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TUSIAD一直以撰写报告的方式为埃尔多安政府出谋划策，包括如何在土耳其建立医疗保险体系、改革退休金制度以及如何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等。

Kaslowski像绝大部分TUSIAD会员一样，志愿工作，每年还交纳1.2万美元的年费。Kaslowski自己的工厂叫Organik Holding，生产精细化学制剂，在荷兰设有分厂，并在全球派有销售代表。在问及为什么不将全副精力投入到自己的生意上去，他拍了拍手底下的一摞文件，说：“如果有其他人来完成这摊子事儿，我倒是很乐意专心去经营自己的工厂呢。”

近年来TUSIAD着力的重点还是力推土耳其加入欧盟。除了发表各种报告，他们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以及巴黎和柏林设立办公室，并派驻代表为土耳其极力游说。尽管目前大部分土耳其人仍觉得加入欧盟是件好事，但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但TUSIAD没有放弃。人们为了土耳其能在2015年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而努力，推进土耳其的民主改革，并达到哥本哈根标准。“TUSIAD从创立之初就一直在战斗，我们会坚持下去。” Kaslowski说。

Knaus: 土耳其将是下一个西班牙

采访_文海晶 黄锆坚 摄影_Zafer Özcan



Gerald Knaus看起来非常年轻，但在我们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土耳其专家。短短半个小时，他抽丝剥茧地剖析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未来。Knaus是ESI的一位创始人。这个机构的全名是European Stability Initiative，一家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宗旨是为欧洲的稳定和繁荣提供独立分析。在其创建后的7年里，ESI对东南欧（如科索沃、波斯尼亚）的国际政策有切实的影响。

在Knaus高速语句的灌输下，土耳其的经济结构在我们面前立体而纵深地展开。他也为我们指出中部城市开塞利对土耳其的重要性：土耳其过去25年的改革英雄都是开塞利人，那里的社会氛围（信仰宗教、亲商业而且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为土耳其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当然，Knaus也是我们开塞利之行的指路人。

《东企》：土耳其为什么有那么多庞大的家族企业呢？

Gerald Knaus：土耳其当代经济史有很关键的两点。

第一点是，直到1930年代，土耳其可以说没有任何本土商业存在。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从事商业的都是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而穆斯林精英阶层极少有人从商或进入制造业。土耳其的商业是从1930年代凯末尔当政后起步的，当时的土耳其一穷二白。是政府一心要培养土耳其的资本家，于是产生了像今天的Koc和Sabanci这样的家族企业。

这些家族起步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是私营企业家，但和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迫切希望将产业多元化，以分散风险。

当土耳其经济在五六十年代得到巨大发展时，这些家族涉足了各行各业，包括金融、制造、房地产、酒店服务等。直到1970年代末，这些家族企业一直主导着土耳其的经济。它们和国有企业很像，壁垒很高，极受政府保护，针对的是国内市场。

第二点，到1979年时，老的模式行不通了，土耳其出口极少但大量进口，加之石油价格上涨，土耳其突然就缺少硬通货为进口物品买单了。厄扎尔（Turgut Ozal）总理上台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厄扎尔在中部安纳托利亚长大，对当地的小规模商业很有了解。他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相信土耳其向世界开放的话是会有竞争潜力的。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土耳其降低了贸易壁垒、并向出口型经济发展。同时他支持社会保守主义，他是第一位作为穆斯林去麦加朝圣的土耳其总理。他信仰伊斯兰教，相信市场经济，亲西方，而且他首先提出土耳其应该加入欧盟。

土耳其在过去三年中的私有化进程比之前的二十年都要快。外国投资在土耳其大大攀升，在90年代从未超过十亿美元，而去年达到了一百多亿美元。厄扎尔改革之后的第二轮经济改革就发生在近几年。这和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是同时的。

《东企》：那么，大多数土耳其人对加入欧盟持何种态度呢？

Gerald Knaus：从民意调查来看，大多数人仍然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而大多数人也越来越相信这不会发生。这两方面的原因，欧盟从来对扩张都持怀疑态度。法国在1970年代末向西班牙发出信号，让他们不要加入。而在土耳其这方面来说，教育系统一直宣讲外面的世界我们极不友好。所以，土耳其的经济越来越自由化，政治越来越自由化，然而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的抵抗情绪却在上升。这是这个国家过去七十年民族主义的教育所造成的。

《东企》：您认为欧盟应该接纳土耳其吗？

Gerald Knaus：我认为欧盟应该接纳土耳其。欧盟的扩张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些国家。爱尔兰曾经非常贫穷，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波兰和保加利亚都一样。如果土耳其加入，也会顺着它们的轨迹发展。吸纳土耳其为成员对欧盟也有很大的好处。接收一个穆斯林国家成员是会给欧盟加分的。我刚去过叙利亚的第二大城市，这里离土耳其边境只有30分钟车程，你可以看到土耳其经济的发展让周边国家的人眼前一亮。土耳其成了他们最新的榜样。就在几年之前，伊斯兰世界还并不把土耳其放在眼里。土耳其不过是美国的盟友，是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而不是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然而本届政府让他们另眼相看。他们不仅是虔诚的穆斯林，而



开塞利：土耳其中部崛起

文_黄锴坚、文海晶 摄影_邸晋军

这个商贸小镇，以制造中心的身分，进入全球经济的产业链。
从过去的羊毛、小麦和地毯，进化到今天的家具、牛仔布和电缆业。

在某些欧洲人眼中，土耳其存在两个灵魂，但只有一个是西方的。他们将国际性的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以及海岸度假村，与土耳其广阔的内陆作对比，后者被视为贫穷落后的，而且不具有“欧洲价值观”。

但近年来中部安纳托利亚的经济奇迹，却让许多人惊讶。这个中部安纳托利亚省份，刚好位于土耳其国土的几何中心，距离东西边界差不多都是900公里。沿着丝绸之路的旧址，许多商贸小镇经历了一场工业革命，以制造中心的身分，进入全球经济的产业链。从过去的羊、小麦和地毯，进化到今天的家具、牛仔布和电缆，土耳其的媒体与学者开始用“安纳托利亚老虎”来描述这个地区崛起的城市。“四虎之一”的开塞利(Kayseri)，是我们土耳其之行的另一站。

开塞利今昔

走出机舱，我们立刻被开塞利的蓝天白云所打动。和伊斯坦布尔相比，这里的空气明显干净得多，耀眼的阳光让人仿佛置身内蒙古草原。更漂亮的是Erciyes山，在开塞利的任何地方，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座头顶皑皑白雪的死火山，和明信片中的富士山几乎一模一样。

往西几十公里，就是著名的卡帕多其亚。Erciyes在远古时代喷发的熔岩，造就了奇特的蘑菇形石林地貌。大约一千年前，基督徒在这些奇形怪状的石笋中挖出岩洞，画上基督像。成千上万的信徒来此朝圣。今天，这些遗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推开市中心希尔顿酒店的窗户，开塞利的历史一一在目：黑色的塞尔柱城墙，巴扎(市场)闪亮的屋顶，以及该市主要的清真寺和宣礼塔。开塞利的名字出自罗马时代的Caesarea，当时是小亚细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一站。11到13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在这里建起他们在安纳托利亚的一个据点。而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建筑师Sinan (1490~1588)就出生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在西方人眼中，这片土耳其的腹地，过去一直沉浸在深厚的传统生活中：家长制、乡村生活不变的缓慢节奏、主要依靠小麦、羊毛和地毯生产的经济。1949年，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前任官员Max Thornburg这样写道：“人们对土耳其的印象是附加其上的从国外引进的薄薄的现代性，而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仍身处于中世纪甚至古代的生活。”30年后，美国人类学家Carol Delaney花了两年时间研究中部安纳托利亚。她发现乡村生活改变甚微：“在村民的理论中，只有男人能传递生命的火花”，另一方面，“村民必须工



作，但他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工作都被看低，显然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由工作来定义的，典型的人类活动就是休息。”

这样的描述早已过时。在开塞利城区，我们看到的是高档住宅区、精美的购物城；在开塞利周边，则是整齐的厂房、流水线和训练有素的工人。在旧城区的边缘，有上世纪大工业的地标：1926年开工的飞机厂，远处是正在快速扩张的Erciyes大学。西边，在Erciyes山脚，是著名的Hacilar镇，土耳其500强企业有9家出自这里。

沙发革命

在开塞利工业委员会(Kayseri Chamber of Industry)的总部，我们见到了Mustafa Boydak。他是委员会的主席，刚刚接待了一个来访的商业团体，马上又要飞往塞浦路斯，参加一个朋友的酒店的开业仪式。短短半小时的采访，不时被电话打断。这位长着典型中亚面孔和身材的企业家，大大咧咧地对着电话嚷嚷，土耳其语抑扬顿挫，似乎很不耐烦。

其实我们本想采访他的叔叔，同名同姓的Mustafa Boydak，但老人前年已经去世。老Boydak从开塞利镇的木匠学徒起步，和哥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创业，将Boydak控股公司发展成如今拥有22家公司的集团，业务涉及家具、银行、运输、贸易和电缆等多个领域。Boydak控股公司雇用了一万二千多名员工，2004年销售额达12亿美元。



小Mustafa目前负责Boydak控股旗下的金融业务。据我们所知，伊斯兰教规禁止穆斯林从事与高利贷或利息相关的活动。那么Boydak是怎么运作的呢？

Mustafa松了松领带，解释说，伊斯兰银行鼓励穆斯林投资，在商业运作中成为共用利润和共担风险的合作者而不是成为债主，这与基于利息的非伊斯兰商业银行系统不同。他还介绍说，伊斯兰银行所有投资的钱，都用于“有道德”的产业，所以不会投资于烟草、酒厂、色情作品等行业。

Boydak旗下最知名的品牌还是家具，Istikbal黄色和蓝色的标签，以及Bellona的绿松石旗帜，今天可以在所有土耳其乡镇中找到。Boydak从小车间变成家具业巨头的故事，也折射着开塞利的历程：从一个传统贸易市镇崛起为一个现代工业城市。

在传统的中部安纳托利亚家庭，人们坐在sedir上——这是一个由床垫、毛毯、地毯堆积而成的高平台。人们吃饭时，会坐在地板上，围着一个矮矮的木头桌子，睡觉则是躺在塞满粗羊毛的垫子上，垫子白天就卷起来。垫子和地毯都是妇女在家里用手摇织布机织出来的。可以说，Sedir是农村自给自足的象征。

20世纪60年代的都市化进程，急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新市区公寓，手织地毯被机械产品取代，垫子里的羊毛被金属弹簧取代，人们吃饭时开始使用桌椅。仅在开塞利镇，到20世纪末便有了10万套新公寓。

1976年，老Mustafa和哥哥到欧洲参加家具展，并购买了一些

机器。从手工制造到使用机器，他们发现工业家具生产的潜力。另一个突破是1980年引进的沙发床，这象征着消费社会的出现。在新城市的中心，房子太小，当乡下亲戚来访时，沙发床是理想的解决方案，并迅速成为Boydak公司最畅销的产品。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公司开展了另一项重要的创新：对营销进行彻底革命。过去几十年，顾客和商贩常常来自土耳其东部，他们会直接到开塞利，在车间里砍价，购买家具成品。而1993年开始，Boydak推出了旗舰品牌Istikbal（土耳其语，意为“未来”），并以固定价格目录在全国推广。Istikbal推出独家销售的政策，以加强公司品牌，并开始向国内提供运送套装家具的服务，连同担保和维修。它还游说土耳其标准学会引入家具质量标准。2000年，Boydak创立了另一个高档品牌Bellona，直接与进口家具展开竞争。Bellona很快成为仅次于Istikbal的全国第二大家具品牌。Boydak的成功鼓舞其他人群起仿效。目前开塞利有3500个家具企业。

而Boydak的国际化征途刚刚起步，他们已在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北部开设店铺。Mustafa笑着对我们说，他们两年内将到上海设立办事处。

牛仔布的世界：把脉时尚

在土耳其语里，“Orta Anadolu”的意思是中部安纳托利亚，它也是开塞利最大出口商的名字，过去20年一直是本地的纳税大王。2003年，Orta是土耳其25家利润率最高的公司之一，他们现

在每年生产4500万米牛仔布，占据世界牛仔布总产量的1/100。

“20年前，人们自己亲自买布料，让裁缝度身定做。但今天，很少有土耳其人这么做了。他们直接去店铺购买服装。除了Levi's、Diesel等国际品牌，土耳其也涌现了Mavi、Colins、LTB等本土牛仔品牌。牛仔布厂商必须适应产业转型，作出相应转变。过去人们直接从我们这里买布，按米计算，所以颜色有区别、质量有参差也无所谓。但现在，我们都是向国际国内品牌供货，质量要高，染色要一致。其实纺织业的技术变化并不大，只是速度加快了。而最关键的，其实是公司的反应能力，你必须跟上瞬息万变的时尚。过去一年两次更新目录，现在每季都要变换目录。”Husamettin Toprak向我们耐心介绍了产业的变化。

这位结实的中年人，是Orta Anadolu公司的“及时交付主任”（On-time Delivery Director）。这个特别的职位只有8年历史，它的名字告诉我们，牛仔布产业的关键，是及时交付。当然Toprak的责任也就非常重大。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全球化现象：安纳托利亚工程师迫不及待跟上瞬息万变的青少年时尚。高速编织机必须不断根据对下一年的牛仔裤流行趋势预测进行调整。全球化使得消费和生产两端的消息传递无比迅速。牛仔布厂家运作的关键，在于读懂洛杉矶、伦敦、东京甚至上海青少年的想法。如果说Levi's、Diesel等服装品牌在款式方面要创新和引领潮流，那么，Orta这样的公司，就必须在面料方面保持创新，了解甚至创造潮流。目前，Orta在全球各大都市都有触角，他们的研发中心则位于伊斯坦布尔。

公司总经理Emin Molu正在美国考察市场。他委托Toprak给中国来的记者介绍公司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初，当Mehmet Ali Babaoglu和Emin Molu（曾分别在德国与曼彻斯特学习纺织工程）加入Orta Anadolu时，这家纺织公司已濒临破产的边缘。它用收购来的本地棉花生产廉价布料，然后卖给自己做衣服的土耳其家庭。

土耳其纺织业的故事，其实也是世界各国早期工业化故事的延续。棉纱和布料生产技术的快速变革引发了英国工业革命。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超过半数的日本工人就业于纺织业——二战前日本唯一在国际领先的产业。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取得了领导地位，其制造业的半数岗位是纺织和制衣。近年来，中国内地走上日本、香港与韩国当年的道路，取得在世界纺织业的主导地位。

土耳其的故事则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在苏联的援助下制订了一个五年发展计划。1934年，土耳其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控股公司Sumerbank，来管理所有的国有工业企业。Sumerbank综合了银行、投资者和管理人的角色，它接管了原奥斯曼帝国的纺织工厂，在全国各地建立纺纱和编织企业。开塞利Sumerbank工厂是苏联棉花厂的直接复制品。位于郊区的Sumerbank纺织厂本身就是一个城市，它占地200公顷，有自己的热电厂，为2255名工人提供足球场、游泳池、面包店和电影院。

土耳其加入北约后，意识形态开始转变，通过贷款计划鼓励私人厂商与进口产品竞争。1953年，开塞利的13个商人联手建立了与Sumerbank模式十分相似的Orta Anadolu。但到80年代初时，Orta并不成功。工厂长期管理不善（股东数量超过100名）、劳动力臃肿（1400名工人，仅生产五六百万米布）、无法采用新技术。此时，开塞利的两个富裕家庭买断了景况不佳的Orta并引进新的管理层。

上世纪80年代初，土耳其总理Turgut Ozal积极推广土耳其企业与外商合资。美国服装巨头李维斯（Levi Strauss）的代表与Orta签署了合同，使其成为李维斯欧洲工厂的供货商。1984年，一个来自李维斯美国供应商的美籍工程师来到开塞利，教给Emin Molu和他的团队必要的工艺。

在Toprak的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引入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也非常重要，它使得Orta具有类似日本公司的文化。“我们的员工非常稳定，现在的平均工作年限是15年，过去几年只有两三个离职。可能因为我们的收入差不多是本地平均工资的3倍吧，大概每人的月均成本，包括工资和其他社会保障，是2000土耳其新里

在政治层面上，中部也预示着土耳其的未来。这里有土耳其执政党AKP的选民基础，也是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老家。开塞利人对政治和宗教的态度，将为土耳其的转型，提供更多的精神动力。



拉（大约1万元人民币）”。其实Toprak也有自己的纺织厂，他和哥哥正在打造自己的布料品牌，但他仍然选择了留在Orta。

从90年代中期起，Orta开始向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品牌供应牛仔布，如Wrangler、Rifle、Diesel和本土的Mavi等等。Orta并不是开塞利纺织业成功的唯一例子，目前开塞利最大的20家出口商中有5家是在纺织行业。

而国有大厂Sumerbank则已被私有化。今天光顾开塞利的游客，已经找不到Sumerbank当年的辉煌印记。老的车间已经变成Erciyes大学教员的公寓和写字楼。

“过去，国家之间的较量用枪炮，而今天，新的枪炮就是品牌。” Toprak深刻意识到全球化游戏的规则。在全球牛仔布行业，Orta的声誉可以跻身前三，所以他们并不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庞大市场反倒是他们的新机会。Orta面临的挑战，仍然是找到能吸引全球新锐消费者的纹理和色彩，他们的工程师，继续阅读着时尚青年的头脑。

伊斯兰伦理与资本主义

在参观Boydak家具厂和Orta牛仔布车间时，我们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工人们除了有茶歇时间，还会定时去做礼拜。Boydak就把车间一角200平方米的屋子辟为清真寺，而Orta的车间旁，就有一个带穹顶的清真寺。

“我们穆斯林一天有5次礼拜，即便是不太勤奋的青年人，周五中午的礼拜也是不可缺席的。” Toprak眼角的余光瞟着旁边的产品开发经理Aykut Cam。Cam一直陪我们参观工厂，是个友善而健谈的小伙子。听到Toprak的话，他马上离开去做礼拜了。

这是一个让很多人好奇的问题：伊斯兰教义和商业文明有没有冲突？学术界多年都在探讨宗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半个世纪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说过，“有些宗教精神跟经济的发展能保持和谐的关系。如果宗教强调物质价值观、节约和生产性投资、诚实经商、试验和冒险精神以及机会平等，这将有利于经济发展，而要是敌视这些趋势就往往会抑制经济增长。”谈到伊斯兰教在印度，刘易斯认为它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它鼓励人们相信宿命论，抑制创新和改革。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Niyazi Berke也把社会的每一项进步跟土耳其伊斯兰教的逐步“隐退”挂钩。他把伊斯兰教看作阻碍社会革新的逆流。

但是，如果跟开塞利的商人谈论这个问题，他们的看法则完全不同。老Mustafa Boydak说到他的商业道路时，曾引述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十个人里有九个的命运取决于贸易和勇气。” Ipek家具的创办者Saffet Arslan说：“我不认为现代与传统之间有绝对的黑白对立。” Hacilar市长Ahmet Herdem表示：“即便先知穆罕默德也是位商人”，因此，商人社群有宗教信仰是很自然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在说到开塞利社区时会提到加尔文主义和新教工作伦理。前开塞利市长Sukru Karatepe将开塞利的居民同“勤劳的新教徒”作对比：“要了解开塞利，必须读一读马克思·韦伯”（指韦伯1905年发表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加尔文主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火花）。

土耳其著名社会学家Hakan Yavuz说，过去20年来，土耳其一直在进行平静的穆斯林革新运动，只不过被中东更为戏剧化的事件给掩盖了。Yavuz看到伊斯兰理想主义和新中产阶级的物质兴趣之间越来越多的呼应。



很难说，是“伊斯兰加尔文主义”（Islamic Calvinism）在开塞利企业家群体中的兴起引发了商业成功，还是蓬勃发展的经济让他们更宽容地接受关于伊斯兰教义的新解释（强调伊斯兰与现代世界的兼容性）。不管孰因孰果，总之，中部安纳托利亚的新一代与现代性形成了特有的妥协。

中部：土耳其的政治未来

在政治层面上，中部也预示着土耳其的未来。中部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执政党AKP（正义和发展党）的选民基础，也是一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老家，尤其是现任外交部长、副总理Abdullah Gul。AKP的开塞利总部是该党最初建立的几个地区分部之一，在2004年市政选举中，AKP在开塞利赢得压倒性多数的70%选票，是全国城市选举中比例最悬殊的胜利。

AKP政府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定义为“民主保守主义”（democratic conservatism）。该主义包含许多欧洲的中立政治派别的目标，它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财政责任，亲商，支持个体慈善

和结社生活。

AKP的创始人是现任总理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 Abdullah Gul，后者是开塞利最显赫的政治家。Gul于1950年出生在开塞利，父亲是一个在旧飞机厂工作的工人。在伊斯坦布尔接受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后，他成为国际经济学教授。从1983年至1991年，他同伊斯兰开发银行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成立一个政府间机构，以促进伊斯兰国家开发利用金融工具。1991年，他以开塞利代表的身份加入福利党（Welfare Party）。2001年，Gul和福利党决裂，在伊斯坦布尔与埃尔多安（前伊斯坦布尔市长）一道成立了一个新政党——正义和发展党（AKP）。他是最强烈主张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人。早在1999年，他就说：“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融入欧洲，民主人权标准在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

用一代人的时间，开塞利和土耳其中部从一个自给自足式的农本经济社会，发展成充满了公寓式建筑，到处是城市社会打工仔，有着现代需求和口味的新兴市场。而且，当地人对政治、对宗教的态度，将为土耳其的持续转型提供更多的精神动力。

（张芸、莫震宇、韩巍对此文也有贡献）